

走出去，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价值

钟文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1月1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重要部署。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集体学习。此次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勾勒出了中国文化外交的路线图,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

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显著。“欢乐春节”“‘中国文化节’”等大型对外文化项目在世界各地广泛举办,文化交流与贸易贸易双轮驱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为我国在政府间文化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以及多边活动中争取了主导权、话语权,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不可或缺的社会

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构建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配合总体外交大局的官方文化交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文化交流的内在理念与强调“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刻契合。在中美、中英、中欧、中印尼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及中俄、中德等双边文化磋商机制推动下,中国与欧盟、东盟、上合组织及世界多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密切。如2016“中拉文化交流年”“中埃文化年”“中卡文化年”等重大文化年节活动的举办,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连续3年举办的“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活动,为维护区域稳定与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文化部牵头,多部委共同举办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明显增容,2016年共在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座城市举办了2100多项文化活动,海外受众超过2.5亿人次,显示出巨大的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的第三个年头,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愈加频繁。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以及各类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广泛开展,勾勒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壮美图景。

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所说,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国外民众触摸中华文化脉

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理解我们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应当是我们的不懈追求。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彰显价值观念,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近年来,思想对话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文化部举办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在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夯实了中外思想文化领域的对话平台。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独特平台,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文化基础设施。今年,西巴尔干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奠基,雅典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揭牌,金边中国文化之家更名为金边中国文化中心。文化部与地方、企业共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探索也随之更进一步。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由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合作共建。金边中国文化中心则由文化部与云南省委宣传部、昆明新知集团合作共建,是首家由文化部与企业合作共建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显而易见的是,地方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伟事业中来。通过“部省合作”,文化部与地方各省市形成合力,地方对外文化工作思路更清晰,定位更准确。此框架下,文化部实际上成为一个枢纽,架起了连通全国各地文化资源、信息、平台的共享网络,有效推动了各方资源的整合,形成了“一盘棋”的局面。“部省合作”的效果突出表现在地方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合作上。其不但丰富了文化中心的活动内容,也为地方文

化走出去搭建了平台。在文化部的指导下,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与国内多个省市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提供活动场地,国内各省市文化部门提供展览、演出、讲座、报告会等项目资源,合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同时也应看到,一些早已有之的难题亟待破解,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如民间、社会对于走出去的热情仍有待释放。民间文化交流往往更多样、更灵活,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后,民间参与文化走出去的热情随之激增。有关方面或可通过政策手段、财税手段、法律手段进一步鼓励社会参与文化走出去,尝试采取较为具体的准入机制、审定程序、责任制度、负面清单等多种方式、手段,鼓励、引导、整合,促进民间力量发挥作用。

文化走出去的有关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也有待开展。目前,走出去相关研究零星分散,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如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系统而有力的阐释。构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文化走出去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对其目的、方式、方法、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将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推动其向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发展。

此外,在文化传播渠道上,还应重视新媒体,融入信息生活。移动端媒体、互联网等的交互性、及时性和虚拟性特征,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少“文化折扣”。策划、开发、推出一些“线上”对外文化艺术活动,推动对外文化传播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有利于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艺术形式与内容如何双丰收

王安潮

近年来,随着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幅度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形式、新内容探索激励政策的出台,成为艺术创新发展的催化剂。这除了反映在传统体裁形式的新发展上,还激励了跨界融合形式的涌现。但有些创作一味追求形式创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内容的新探,甚至偏离了内容既定的方向,形式创新反而阻挠了内容的正常表现。如有些地方戏曲剧目,在融入现代多媒体艺术、结合西方戏剧形式之时迷失了自己,反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艺术风格和品位,让人感觉不伦不类,莫衷一是!夸张的形式成为人皆戏谑的“皇帝新衣”!

如何在迎合观众现代视听的形式之需上做到形式创新与内容表现发展的双丰收?著名导演张继刚认为:形式很重要,但内容更重要。形式的创新往往会给人以外在的新鲜感,当年说唱剧《解放》在京上演,从未见诸舞台实践的“说唱剧”形式就是最大的亮点,它结合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说唱、民歌、戏曲、器乐、民俗等形式,又结合了西方舞剧、歌剧、话剧的结构优势,在戏剧张力的营造、爱情线索及音乐主题的贯穿上巧妙地构造了一波三折剧情,而中国传统戏剧“悲美”内涵的融入使人看到了形式创新之上不忘内容表现所带给人的特殊艺术效果。张继刚对有人建议改为“说唱舞剧”的形式之说并未直接反对。他说,新的艺术形式的命名要简洁,并且要有一定的包容性、延展性。他认为“说唱剧”就是一个平台,是以说书人为贯穿基础而构架的,并可以融入舞剧等其他形式的艺术形式,在《解放》一剧中可以融入舞剧,今后在其他创作中还可以融入杂技的形式,这要依据内容需要而定,其基本准则是要有高品位的艺术情境,实际的价值取向是最大限度地表现戏剧的内容。

形式创新与内容发展间协调的关系不仅反映在新创形式上,在传统体裁形式的探索中亦然。中国歌舞剧院院长陶诚认为,舞剧这一传统舞台艺术形式在创新中更要有时代的紧迫感,不能枕在既有的优势上裹足不前,《恰同学少年》《昭君出塞》《孔子》《赵氏孤儿》就是在不同主题的题材探索中注意形式的创新。如《赵氏孤儿》就在舞蹈组合形式、表现手法上给人留下形式创新后内容发展的新惑。它在程婴独舞、与妻子的双人舞、与屠岸贾及赵武等人的双人舞、三人舞等处,都注意了主次关系或流畅或模糊的自然顺滑过渡,与既往主次分明的传统表现手法在形式上是较大的新探;而在集体舞的编排上,除了物化形式的外在形式凸显,还注意了现代审美趣味

对形式灵活多变的需求,凸显了古典舞蹈的现代情韵,让人感到形式自由对内容新鲜发展的冲击力,使得先秦时的房中乐舞所特有的内容跃然眼前。

形式创新与内容发展关系的辨明是可以逐步深入的。它要首先在认识上重视,理念上开放;其次要有探索创新的技术基础准备,有吸纳别人建议的思想心胸;再次要能理智地看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样才能不断修改完善形式创新与内容表现的协调发展。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在亲身感受了舞剧《赵氏孤儿》《浮生》与《阿里郎花》、歌剧《岳飞》与《大汉苏武》、说唱剧《解放》、音乐剧《嘎老》和《阿诗玛》、地方戏曲《南国之春》和《清风亭上》等大型舞台作品在多次修改后,感到在形式创新与内容发展的逐渐契合上,需要从观念到技术的多层次推动。剧作家欧阳逸冰认为在在这一渐变过程中,广阔胸怀是剧目实现的基础。

文学期刊经营须求“精”

周慧虹

从曾经的“洛阳纸贵”到遭遇寒冬,经历了20余年阵痛的文学期刊,如今终于开始回暖,重为大众所关注。有资料表明,《人民文学》《花城》《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等期刊近年来发行量基本稳定,有的还保持了逐年增长态势。

网络信息化时代尽管使得文学创作与消费越来越趋于平常、平淡,越来越呈现“失焦”状态,但无疑,作为有着一定“年岁”和传统办刊经验的文学期刊,依然在文学成长之路上扮演着忠诚守望者和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它的此番再度回归令人欣慰。越是如此,越需要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进一步站稳脚跟,必须得培养、造就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特色,有他人所无法替代的精到之处。为此,文学期刊不妨围绕继承与创新投付努力。举例来说,很多文学期刊都曾搞过奖项评选活动,但《青年作家》与《华西都市报》共同举办的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选活动有其独特的地方,该奖项旨在奖励和扶持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改变了目前国内缺乏专门针对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文学奖项的现状,文学期刊借大众强势传媒增强自身影响力提供了成功范式。

社会进步需要文学,文学发展则需文学期刊继续给予鼎力支撑。时代既然再次给了文学期刊重生的机会,那么,我们愿意看到,文学期刊能够不负众望,以做精、做强来回馈读者,也助推文学在创作与传播上不断攀至新高度。

不只在关心“书店”,更应在乎“读书”

赵楠

2016年10月,因为经营不力等原因,北京大学校园内那家与鲁迅先生作品集同名的“野草书店”面临倒闭危机。《北大青年》以《在北大种一棵野草》为题,为野草书店和它的经营者撰写了一篇动情的报道,勾连起无数学子、学者与野草书店相关的回忆。笔者在北大读书多年,从“第三极”“风入松”到如今的“野草”,见证了10年间北大附近几家颇有口碑的实体书店相继(将)倒掉。无独有偶,中国传媒大学等多家高校内,实体书店也相继迎来关张的结局。

实体书店的关张往往成为文化界的现象级话题,常常配搭“国人不读书”“80年代一去不返”等呜呼哀哉的感叹,被建构为时代性的精神危机;而这种关张一旦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则更令关心青年的“好读书”人士和广大实体书店的“情怀党”唏嘘不已。其实比起一间书店亏本消失,人们更感哀伤的是自己曾经的宝贵阅读经验的消逝,和对全社会普遍不再读书的悲观预见——而这种预见,又紧密夹杂着自己自己已经知觉的远离书本、远离阅读的危险体认。鉴于此,笔者想说,比起热络地关心盘点哪家实体书店又倒闭了,不如扪心自问自己最近读了几本书;真正的情怀不只在有可以安心挑书读书的实体书店,更在于读书本身。

无论是在大学校园,实体书店的减少恐怕是时代发展的某种必然,但与“阅读行为减少”的担忧不构成必然联系。让我们仍把视线搁置在北大校园,野草书店和与它一墙之隔的中关村电脑城几乎保持着同步的命运:随着网络购物、电商的兴起,早已逝去往日繁华,当年在电脑城摆摊的刘强东早已创办

了“京东”。很多网上书店购书折扣大、选择多、递送快,品位也不差,有的网上书店则直接由大型出版社自行经营,并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及时传递好书快讯;而靠谱的电子阅读,不论是图书馆的数据库还是各大网商的电子书,也都价廉而便捷,有一个kindle之类的阅读终端在手,亦不耽误读书和批注本身,也更对“穷学生”的胃口。尽管实体书店在减少,但大学生和真正的“读书人”,其网络购书量和电子阅读量,以及在图书馆的借阅量,并没有依照“书店情怀”的设想悲观下去。

实体书店的减少也并不意味着意味着读书氛围的消失。诚然,书声琅琅、墨香阵阵,一个好的实体书店能够带动个人、家庭和社会热爱阅读的氛围;许多人人念念不忘的,也是童年或青年时期泡在小城唯一一处新华书店含英咀华的单纯时光。然而美好的求学岁月结束,在工作繁冗和刷手机流行的今天,我们不该把“不阅读”的“账”算在实体书店减少的头上。阅览室、自习室、读书会……大学校园本就不缺乏阅读空间;在家里,在休息室,在地毯上,在和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只要有阅读与学习的心境,随时随地都可以为自己和家庭打造一间“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亦不能以“知识”的名义高高在上,相关的阅读空间如果不与时俱进,也必然要遭遇市场和时代的淘汰。尽管实体书店的倒闭成了“现象”,但在北京的图书市场,依然有坚挺、甚至更加勃兴的实体书店存在。三联书店24小时不打烊的阅览,第二书房寓教于乐的亲子阅读等都做了很好的示



黄卓绘

范。多年来,文化部门也一直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动实体书店及互联网阅读的发展,引导和方便人们好读书、读好书。而反观个别老牌的书店,打折力度没诚意、图书分类混乱、用购书卡提书必到现场,给读者兼消费者造成诸多不便,实在是实体书店自己在“远人”。一些地方部门大力倡导书香阅读,设立社区“阅读空间”,却也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笔者曾观察过东城区人民政府在朝阳门附近开设的“阅读空间”,每天下午5点前一定会关门下班,而对于很多市民和家庭来说,下午5点以后正是结束一天工作或学习、开始计划享受阅读的时段。如此“阅读空间”便沦为一样摆设,并没有真正服务于市民阅读。

当然,人们由实体书店减少而哀叹

不读书,还有另外一重隐忧:电子阅读靠谱么?纸质书才能更好地引导“深阅读”?……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历史”地看:在苏格拉底的时代,他就对“写作”这种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表示过担忧。他认为用阅读取代“口口相传”的记忆可能最终会使我们变得不再聪明。类似的观点和讨论也曾出现在印刷媒体和打字机发明后提出过,一如我们今天之于电子阅读的讨论。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这种阅读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尚不见得就会造成人类思维的退化。时代为阅读提供了新的法门,不妨先热情拥抱,以热爱阅读的名义。

还是那句话,真正的情怀在书里。实体书店的倒掉不是重点,也并不可怕,请回归你自己的书目单,看看最近真正读了多少书。

都处在古往今来的文化链条之中,都应尽可能地地为后代准备更充裕的条件、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开拓更宽广的空间。有文化情怀的官员,不会滥用今天的权力,因为他知道,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连接着后人的福祉,只有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才能充满深情地投入工作,妥善处理好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成为受下一代人尊重的前人。

正是文化情怀,使得一个官员超越自己个体生存的局限,以更崇高的价值坐标,在宏阔的历史尺度上理解和看待世界。这样,他就不可能不谦卑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谨慎运用权力的好公仆,显示出执政的水平和人生的境界。

文化情怀是检验官员执政境界的重要标志

杨晓华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进入人类意识范围的一切事物都可能涉及文化。文化流贯在世界中,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不可能在不涉及文化的状态中生存很久。一个官员,拥有社会公职,处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即使在业务和分工上,不属于文化部门,其工作也不可能不涉及文化。因此,官员的文化情怀就变得十分关键。在笔者看来,文化情怀就是清醒而充分的文化意识、正确而深刻的文化理想,丰富而持久的文化热情、纯粹而美好的文化理想。一个官员的文化情怀主要体现在他运用公权力的言行之中。

有文化情怀的官员懂得敬畏前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文化的生命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体现出

个体、家族、团体、社会、国家的共通性和传承性。每一代人只能通过前人创造的文化融入世界。前人的喜怒哀乐,前人的爱恨情仇,前人的理想愿望,前人的经验教训,都凝结在他们在大地上留存或洒落的物品上。因此,对前人的追存和追述,我们都应该心存敬意,对那些高密度地凝结了前人创造、随着时光流逝有可能损坏、腐蚀和消亡的东西,我们更应该珍视和爱护。一个有情怀的官员知道,敬畏前人就是善待我们的过去,就是维护我们生存和创造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保护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有文化情怀的官员懂得尊重今人。人是文化创造中最活跃的因素。从物质形态的构筑,到规范规则的建立,从

思想理念的追寻,到价值核心的确定,在文化形成的各个层面,人都是决定性的动力。有文化情怀的官员,懂得尊重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而建造的家园、制作的物品;懂得遵守体现社会公众意志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懂得认真对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思考和依靠这些思考所得出的恰当的结论;懂得尊重人们通过哲学、艺术、宗教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因此,一个有文化情怀的官员,会善待自己工作中接触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只有高质量地与他人的协作和共处,才能高质量地生存和创造。

有文化情怀的官员懂得尊重未来。人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存在,每一代人也不仅仅为自己而存在。每一代人